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礼学档案

曾军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礼学档案

曾军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学档案/曾军编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5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ISBN 978-7-307-17205-0

I. 礼… II. 曾… III. 礼仪—研究—中国—古代 IV. 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2264 号

责任编辑:李程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6.5 字数: 542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7205-0 定价: 10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百年礼学话转型(代序)	(1)
百年来礼学经典论著评介	(17)
释禮	王国维(19)
【评介】	(19)
礼学略说	黄侃(34)
【评介】	(57)
礼记引得序	
——两汉礼学源流考(存目)	洪业(74)
【评介】	(74)
中国礼俗史发凡	柳诒徵(84)
【评介】	(121)
周官著作时代考(存目)	钱穆(139)
【评介】	(139)
礼经十论(存目)	段熙仲(162)
【评介】	(162)
“冠礼”新探	杨宽(167)
【评介】	(184)
郑氏校雠学发微(节选)	张舜徽(190)
【评介】	(193)
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	沈文倬(201)
【评介】	(247)
中国礼教思想之我见(存目)	蔡尚思(252)
【评介】	(252)
《周礼》的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	彭林(257)

【评介】	(269)
凌廷堪的礼学思想	
——“以礼代理”说与清乾嘉学术思想之走向	张寿安(275)
【评介】	(322)
中国礼学史发凡	杨志刚(327)
【评介】	(340)
《仪礼·丧服》所体现的周代宗法制度与伦理观念	丁鼎(343)
【评介】	(362)
中国传统法的结构与基本概念辨正	
——兼论古代礼与法的关系	曾宪义 马小红(367)
【评介】	(388)
新蔡简所见楚地祭祷礼仪二则	杨华(392)
【评介】	(412)
《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与《论礼》纂辑之比较	
——以《民之父母》为讨论中介	林素英(417)
【评介】	(449)
《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	
论述	郭齐勇(453)
【评介】	(465)
百年来礼学论著提要	(477)
百年来礼学大事记	(565)
后记	(579)

百年礼学话转型(代序)

礼是中国文化的内核，也是古代中国整合社会的总枢纽。20世纪以来，素有礼乐文化之称的中国文明，在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下，有挫折，有自卑，但更多的是革新自身以求进步。礼学的内涵是无穷的，对礼乐文化多重价值的发掘是无限的。它就像一个多棱镜，从不同角度，都能映射出丰富多样的光彩来。

20世纪中国各方面的深刻变化都与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接受异质文明有关。不同在于前一次是被动的，可以追溯至19世纪40年代；后一次则是主动的，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影响延续至今。在礼制已经成为旧社会殉葬品、科学民主思想成为共识的20世纪，礼学深受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影响，逐渐区别于传统经学范畴中的礼学。伴随着文化“古今中西”问题，礼学在这百年中备尝艰辛，几经停滞，依然不绝如缕，终至转型。前期从经世治民之典退到史学领域，后期从史学及哲学等多学科中逐渐发展，汇聚成为一门专学，逐步重获社会的理解和关注。

一、新思想、新材料、新方法

20世纪的中国是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中国。异质文明传入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如新思想、新材料、新方法，引发了礼学研究上的巨大改变。

(一) 科学与进化

20世纪思想史上的关键词当然非“科学”莫属。此间，科学思想不像19世纪那样主要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作用，而是深刻地影响着

人们的思想行为和全部社会生活。英国彼得·沃森说：“20世纪受知识支配，或‘屈服于’科学。居支配地位的知识性走向是深刻的，因为科学的贡献不仅涉及新产品的发明，也涉及已经改变人们全部生活的具体领域。……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大综合的趋势……它们在共同讲述着自然界的故事……进化的过程构成了这个故事的基础，并为其提供了框架。”^①进化论从生物学界传播到社会学科，成为整个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在严复译介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和马君武翻译达尔文《物种起源》之后也迅速传播到中国^②。《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思想，用之于认识人类社会，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拉开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社会变革、变法图强的序幕，并迅速席卷全国。

20世纪前后中国的政治革命、文化运动与社会变革，都是以这种思想观念为内在驱动力的。“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③正是由于这种倾向，使得“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④。科学与进化成为20世纪前后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词。

科学、进化论影响到史学，直接催生了“科学的史学”与进化史观——“新史学”的诞生。晚清康有为宣扬公羊学“三世说”的《大同书》将经今文学与进化论思想结合，他的学生梁启超1902年著《新史

① [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② 张法：《中国现代性以来思想史上的五大观念》，《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性历程中产生出的名词、概念、观念、思想里，最主要关键词是：进化、革命、阶级、改革、和谐。

③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④ 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民铎杂志》1922年第3卷5号。

学》批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明确提出科学的历史即进化史观的新史学。许冠三指出：“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与‘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异，且与时俱变”^①，表明科学与进化论思想的传入，成为旧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标志。

进化史观又衍生出唯物史观、社会阶级分析法。受进化论影响，1877年摩尔根《古代社会》^②提出了社会进化理论，阐述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说明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原始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摩尔根的古典进化论成为唯物史观及阶级论的思想资源，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高度评价了该书。中国的部分史学家深受其影响，自觉秉承这种史学观。不仅如此，摩尔根的研究还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也丰富了对礼的起源的探索。

新史学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社会的进步就是以民主社会代替专制社会，以自由平等取代封建等级。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随着民主思想的传入，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希望通过讨伐礼制来反传统，通过摧毁人们对礼的价值信仰来进行新思想的启蒙。这个突破口无疑是准确的，而且取得了相当成功的效果。

一时之间，礼变成了集中讨伐的对象。文学界站在批评的最前沿，声浪最高，影响最大。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祝福》中“吃人的礼教”，冰心问题小说对家庭问题的暴露，巴金《家》、《春》、《秋》系列对家长制的控诉，无一不激起人们对礼教、礼制的痛恨。文学表现的极端化，部分波及学术评判。礼被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等级制度、摧残人性的工具，礼治、礼制、礼教都被从各个角度大力批判。当“礼义”思想被否定，以之为核心的礼制、礼教、礼仪、礼治随即

^①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9页。

^② 最早中译本是杨东莼、张栗原译，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版。

溃不成军。梁启超质疑说：“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我们不能不根本怀疑。……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敝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①礼学处于覆巢之下难免岌岌可危的命运。

(二) 实证与考古

现代学科体系中一些学科的发展为礼学的发展开辟了另外的空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史学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吸纳。哲学的实证主义，考古学的新发现，社会学对经济状况的分析，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都给礼学以较大的影响。

实证主义主张以科学方法建立经验性知识，追求知识的客观性，主张实事求是，传递着科学的理念。它与清中期乾嘉考据学无论是在原则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相通之处，因而更易于中国学者亲近并接受。两者的自然结合从观念方法上给新史学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路径，即变经为史，科学地整理国故，检讨经史典籍的真伪。胡适的老师杜威，就是一个实验主义者。胡适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深受赫胥黎“拿证据来”和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也从清代乾嘉学者的考据方法中获得借鉴。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提及研究国故要运用“历史的观念”时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②他还对《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进行考证。1922年，梁启超《中国史研究法》专章论述史料种类、搜集与鉴别。1928年胡适的学生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③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被称为“新考据派”。周予同提倡“六经皆史料”以建设新史学：“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饮冰室合集7·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0页。

^②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胡适演讲集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③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①这些既有乾嘉考据的继承，也有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王国维、陈垣等被视为史学的考证派，说明重视史料的甄别以及运用科学严谨的史学方法，是 20 世纪前半期史学家的共同旨趣。

以经为史，“三礼”也成为史学各专门史的资料。梁启超 1923 年提出礼学应回归史学，他说：“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史……史的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②此后的礼学的确如梁启超所言，慢慢集中于专门史的研究区域，也出现了不少力作。

给礼学提供新材料的是考古学。考古学新发现给习惯于从文献到文献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新路径。王国维概括 20 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③金毓黻有所补充：“近四五十年内所发见之史料，其最有价值者，凡六，一曰殷墟之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及西域各地之汉、晋简牍，三曰敦煌石室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古代汉族以外之各族文字，六曰各地之吉金文字。”^④郭沫若称：“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他们都十分看重考古发现的价值。

^①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33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饮冰室合集 7·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91 页。

^③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7 页。

^④ 金毓黻：《最近史学之趋势》，《中国史学史》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2 页。

考古学受到重视，也与其“科学”特质有关。傅斯年特别重视考古学：“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同，因其与自然界有关；与地质学是不能分开的……考古学与人类学有关，所以古器之外，应特别注意人骨之测量，再根据比较法来推测当时人类之形状与其变化。”^①他认为地质学、人类学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科学推测的可能。这些新发现为史学开辟出新境界，带来了新的机遇。陈梦家在年代学上的成就即得益于此。

具体到礼学，则有1900年西北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六朝至北宋的“五经”写本文献残卷。敦煌《礼记》残卷共12卷，其中郑玄注《礼记》5卷，《礼记音》2卷，为先唐抄本。1959年7月，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发掘出比较完整的9篇《仪礼》竹木简。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804枚竹简，中有《缁衣》与传世文献《礼记·缁衣》近似。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民之父母》与传世《礼记》中《哀公问》《孔子闲居》两篇内容相似。在这种有文字记载的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如仰韶、良渚、三星堆等文化遗址以及墓葬中的器物，都给礼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改进了礼学研究方法，开始了礼学研究重视实物、将文献资料与新旧考古资料结合利用的历史。

文化人类学为礼学提供了民族学、文化学的视野及田野考察的方法，使礼从庙堂、宗祠走到民间，使风俗、习惯、仪式进入礼学视野成为主角，此前被忽略的一些民俗资料逐步受到礼学的重视。人类学的视野又引起礼学研究者关注风俗习惯与原始宗教信仰之间的关联。如李安宅所说：“中国的‘礼’字，好像包括民风、民仪、制度、仪式和政令……大而等于文化，小而不过是区区的礼节……礼就是人类学上的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②这种“礼即文化”的观念到20世纪后期已成为礼学研究的普遍共识。

^①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95页。

^② 李安宅：《〈仪礼〉与〈礼记〉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二、从经学到史学

20世纪前期礼学大体趋势是逐渐摆脱经学,进入科学的史学之中。传统经学范畴中的礼学,建立在经典文本是可信且可践行的信仰前提之下。礼学至今尚无通史,足见礼学之繁难。古称议礼如聚讼,也非言过其实。但古礼之损益始终是以经学为依据,为政治作文饰。随着新思想的传入、新材料的挖掘、新方法的运用,经学整体上向史学转化。史学逐渐走向科学化,表现为重视专门史的分类研究,以便于各自纵深发展。礼学研究于是主要活跃于新史学的专门史中,从注重践履与社会的组织整合功能转向史学的研究。

关于新史学的发展脉络,冯友兰概括为“信古、疑古、释古”^①,钱穆分“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②。金毓黻说:“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③1941年,周予同将新史学五十年分为偏重史观和史法方面的史观派和专究史料方面的史料派,史观派中又分疑古(胡适、钱玄同)、考古(王国维、李济)、释古(胡汉民、郭沫若、陶希圣)三派。其中,疑古派破坏伪古史,考古派以建设真古史为职志,释古派注意社会史及全面的通史的研究^④。1986年,许冠三总结新史学九十年,梁启超和张荫麟为开拓者,其余分为考证学派(王国维、陈垣),方法学派(胡适、顾颉刚),史料学派(傅斯年、陈寅恪),史观学派(李大钊、朱谦之、常乃惠、雷海宗、郭沫若、翦伯赞、范文

①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三松堂全集》第14卷《杂著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此文写于1935年5月。

②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24页。

③ 金毓黻:《最近史学之趋势》,《中国史学史》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页。

④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9页。

澜)，史建学派(殷海光、许冠三)^①。其中周予同所谓的释古派与许冠三所谓的史观学派，都是指唯物史家。钱穆则不在各派之列。以上学派划分大体上是一致的，可清晰看出新史学前半期百家争鸣之势。

综上可知，新史学与旧史学的区别在于对“古”的态度，新史学内部各学派之间的区别，则取决于研究“古学”的方法。这个时期的礼学家，都是史学家而非礼学专家，多对礼学有所涉猎，但并不专门致力于此；都具有古学功底、西学背景，皆可谓“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业”^②。他们因所受外来思想影响的学科门类不同，显现出礼学研究的诸多差异，以下择其典型者分别述之。

开现代礼学研究风气之先的是王国维先生。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礼学著述，莫过于他的《释礼》等礼器文字考释系列与《殷周制度论》。前者重考，以字的形、音、义的演变推究古史礼仪的形成过程；后者重论，以“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精确概括殷周剧变的制度精义。二者皆是荫泽后学的巨著，从文字、器物、制度三个维度入手，不仅站在考释考古资料的前沿，开启了以字说史，文字学、金石学、考古学、校勘学、甲骨学、敦煌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治学路径，而且提出了诸多礼学问题，如殷周剧变、宗法制度、周公制礼、君统宗统等，成为后来几十年的礼学研究热点，无疑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去钻研。沈文倬先生治礼方法与王国维先生类似，且专精于礼学。著有《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和《蕝圃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皆是从小处着眼、精深独到的光大绝学的精品，尤以《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一文最为人所称道，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对礼典和礼书形成过程的还原，令人信服。

同样得益于考古新发现的还有郭沫若先生。郭沫若长于文字学、金石学、甲骨学，著有《周官质疑》、《谥法之起源》，以彝器铭文为铁证，对王国维之论断或疑或补。前者据彝器铭文中所见周代官制如

①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

② 案，此处借用许冠三先生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语，意思略有不同。

卿事寮大史寮、三左三右、作册、宰、宗伯、大祝、司卜冢司徒、司工、司寇、司马、司射、左右戏鰪荆、左右走马、左右虎臣、师氏、善夫、小辅钟鼓、里君、有司、诸侯诸监共二十项考《周官》之真伪，认为《周官》是“周公致太平之迹”的说法迂诞，该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文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①。后者举周穆王以后五器铭文，推论谥法之兴当在春秋中叶以后，又举《左传》与《吕氏春秋》中两例推测谥法之兴在战国时代。古文字学家张政娘、考古学家张光直也撰写过这类礼学论文，对一些礼学疑点提供了较有力的证据。

郭沫若又深受唯物史观影响，他采用社会学的阶级、经济等分析法，将西周社会定性为奴隶社会，认为礼是奴隶主贵族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杨宽、杨向奎与他的这类观点相近，再辅以人类学方法。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著作时代》(1954)根据《周礼》中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推断其成书时代，《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1992)认为礼尚往来起源于商业性质的交换，乡饮酒礼是父系家长制转化为宗法制度后贵族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杨宽的《古礼新探》(1965)认为冠礼源自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就是这类研究的体现。

顾颉刚先生以疑古辨伪著称。他对史实、传说详加考辨，对“层累造成的古史”进行辨伪，一层一层剥离伪饰，还原古史真貌。他与一些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掀起了一股“古史辨”热潮，考辨经史文献之伪。虽遭“古书辨”和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之批评，但确属以严密的史学方法整理古史的典范。《“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肯定周公做了选择损益殷礼的工作，剥离“周公制礼”传说中夸大的成分。他认为《周官》的出现与齐国稷下之学、《管子》一书有很大的关系。他发现，稷下之学的主题是建立统一帝国时代的新制度，如天子巡狩礼、封禅等，《管子》含法家治国诸思想，《周官》则将两种理想统合在设官分职之中。它的出现不可能在周公之时。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及《刘向歆父子年谱》是以历史学、文献考据学

^① 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1页。两文皆收入其中。

的方法来研究《周礼》的著作时代，批驳了《周礼》为周公所作，或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

20世纪礼学受文化人类学启发较大，且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常常综合运用。较早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系统研究礼类经典的是李安宅，他于1931年前后撰写《〈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将《礼记》、《仪礼》作为社会学史料，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礼学研究视角。费孝通《乡土中国》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①的概念。文化学家柳诒徵则从礼俗入手，他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与《中国文化史》第一编第19章“周之礼制”，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揭示了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他对礼、俗之间的关系以及礼俗对于民族的意义，进行了积极的论述。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1933)认为礼俗包括礼仪制度与民间风俗，以《汉书》与《后汉书》等史料考汉代的婚姻与丧葬礼俗，是一种社会史与考据的结合。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1947)，则是优秀的风俗学著作。

还有一批学者，秉持客观的史学态度但延续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如黄侃、洪业、段熙仲、钱玄、张舜徽等先生。黄侃先生是在科举制废除，青年学子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对经典非常生疏的情况下受聘南京大学的，因此他的《礼学略说》属讲章性质，重在介绍礼学大略。如欲通“三礼”郑学须假道于陆、孔、贾、杜四家之书；古人读礼之法有分节、绘图、释例三种；礼有三层礼意、礼具、礼文等。他所提出的治《礼》次第“以辨字读、析章句为先务；次则审名义，次则求条例，次则括纲要”，颇有“由小学入经学”的清学特色。洪业先生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辑处主任，1937年前后主编了“三礼”的引得和注疏引书引得，其为治礼用目录学。段熙仲是柳诒徵的学生，然长期研究春秋公羊学，治礼从经今文学。《礼学十论》的礼经春秋学术同源等观点，实际是提倡以辨明章句和体会微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费孝通文集5·1947—1948》，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9页。

言大义为治经方法。钱玄先生长期从事汉语文史教学及文字、训诂、校勘,其治礼偏重于名物训诂,著作有《三礼名物通释》,晚年出版《三礼辞典》、《三礼通论》,都是治三礼之学必备参考。张舜徽先生以史学、小学、文献学名家,他的郑学研究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郑学丛著》是对郑玄注经体例所作的文献学归纳。这一批学者在现代史学的科学框架中更注重传统经学中合理因素的继承。

总而言之,20世纪前半期,史学家以通人之资,立足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展示出20世纪前期礼学研究的丰富多样性。这个阶段,在怀疑古史和古籍真实性的思想风气下,实证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大行其道,礼学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专门史,疑古辨伪、校勘整理、史实求证成为礼学研究的主流。如对礼的起源、周公制礼说的讨论,对《周礼》成书时代的考证,对《礼记》成书及篇数的商榷等论争焦点,与20世纪前半期注重知识的客观性,力图客观认识古代社会有关。在摆脱经学信仰之下,为礼学的史学发展澄清了一些认识。

三、从史学到礼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礼学研究者极少,偶有零星论著,往往是老一辈学者的书篋珍藏。新一代礼学研究者,直到90年代前后才真正崛起。台湾学者则保持了连续性,间或有礼学新作问世。这一时期礼学在史学之中逐步发展,在现代学术学科细分的影响下,专门家越来越多;随着西方各种理论的涌入,礼学渐渐溢出史学,形成了多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礼学的渐热与时代的变化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再次打开国门,中国文化重回与世界的交流中。前20年中国海绵一般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各种西方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介绍、研究、应用的成果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后10余年中国人对学习西方百余年却陷入“不中不西”的尴尬境遇进行反思,“古今中西”问题更多地涉及如何走出西方话语霸权、进行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关于文化转型和研究范式的思考成为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对

本土文化的关注使得礼的精神价值被重新发现，礼学成为各门学科都关注的对象，礼学方面的专著、论文大量涌现，并且走出了以往批判的思维方式，既反思礼，也反思“五四”以来对礼的批判。这种反思也使得礼学真正摆脱了经学，成为现代学术中的一员。

20世纪后期礼学的思想史研究成就最为突出。礼学继续关注《周官》，但指向有所不同。与前期郭沫若、钱穆、顾颉刚、杨向奎的《周礼》研究相比较，对《周礼》的考察注重思想史发展的线索，更贯穿着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思考。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思想性格》(1980)，循思想与文献两条线索，得出《周官》是“王莽草创于前，刘歆整理于后”、“乃王莽、刘歆们用官制以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①的结论，回到传统论断。《中国人性论史》第三章“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之出现及宗教之人文化”，指出礼的形成是宗教人文化的结果。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1991)，系统地研究了《周礼》当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治民思想、治官思想、理财思想和《周礼》所设计的国家政权模式，认为《周礼》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多元一体”，成书当在汉初。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1993)，将《周礼》中所记的各种制度，如授田制、军制、分封制、乡遂制、度量衡、货币制以及社会行政组织、商业、教育、祭祀、法律、风俗等，放在战国时代的宏观背景之下来考察，并以相关文献资料与出土秦简作印证，认为《周礼》是战国末年入秦的学者所作。这些都是将思想史分析与时代社会背景研究结合的范例，也显现出学者们研究中越来越关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思想史研究中，礼学自身的建构也有所发展，如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2005)对礼学思想体系的梳理，中国台湾吴万居《宋代三礼学研究》(1999)，林存阳《清初三礼学》(2002)《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2008)，惠吉兴《宋代礼学研究》(2011)，李江辉《晚清江浙礼学研究》(2011)，对礼学史的断代研究；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2005)，对《礼记》的哲学阐释，

^①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周官成立之时代及思想性格》，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212页。